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开拓创新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四次 全国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杨自俭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这次大会是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受学会的委托承办的。去年经三个专业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商定大会主题与论文议题，发出通知的同时，《外语教学与研究》和《外国语》两刊都全文公布了我们的征文通告。截止到今年4月20日收到论文180余篇。在副会长郭著章教授的精心安排下于4月20—23日在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召开了由正副会长和专业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参加的审稿会，经认真评审，确定了出席大会人员的名单和大会发言的人选，并向办会单位提出了聘请专家讲学的建议。厦大外文学院在连淑能院长领导下为办好这次大会做了非常有成效的准备工作，不仅筹备了较充足的经费，而且对大会的各项工作都做了周到的安排，并邀请了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先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涂纪亮先生和中山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王宾先生光临大会讲学。此外，还请我们学会的学术顾问、外语界德高望重的王宗炎先生为大会写了专文《语言对比小议》。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今天7

月 25 日大会正式开幕了。

今天我想讲以下几个问题。

1. 南昌会议以来的情况

这两年新的一届常务理事会主要做了以下五项工作：

(1)1999 年 6 月在常务理事兼英汉文化比较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罗选民教授组织领导下，由湘潭大学外语学院主办，成功地举行了一次英汉文化比较研究与跨文化交际全国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论文集。(2)由于虞建华副会长精心而得力的工作，于 1999 年 11 月 3 日我会到会的正副会长与常务理事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庄智象社长和王彤福总编辑进行了非常诚挚的商谈，他们全力支持我们学会的学术活动，决定从南昌大会起我会两年一次的大会论文集均由他们出版，并希望我们将第一次和第二次大会论文集的出版权转让给他们，以后由他们重印。这对我们学会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重大支持。在此我代表学会再次对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这种崇尚学术的可贵精神和对我们学会的大力支持深表敬佩和由衷的感谢。(3)我们利用湘潭和上海翻译研讨会两个会议之机召开了两次常务理事会，学习了新会章，研究了学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总结了经验，大家一致认为，学会的头等大事是开好全国研讨会，出好论文集，为此我们认真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全国学术研讨会及其论文集出版问题的意见》(见第 15 期《简报》)。南昌会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和这次厦门大会的筹备工作都是严格遵照上述决定进行的。(4)认真筹备了这次大会。(从略)(5)萧立明常务副会长和刘天鹤秘书长亲赴北京做完了学会的重新登记工作，但此项工作上级领导机关尚未办完登记手续，尚须耐心等待。以上工作的完成全靠常务理事尤其是正副会长的同心同德、任劳任怨、团结协作。

这两年我们学会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现就我知道的一部分向大家汇报如下。

关于语言研究方面的著作已出版的有赵世开主编的《汉英对比语法论集》、汪榕培的《英语词汇学研究》与《英语词汇探胜》、黄任的《英语修辞学概论》、李国南的《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方梦之的《英语科技文体 范式与应用》、王寅的《论语言符号象似性》、柯平的《对比语言学》等。翻译研究方面的著作与辞书有刘重德主编的《英汉翻译例句词典》、刘宓庆的《翻译与语言哲学》与《文化翻译论纲》、陈德鸿与张南峰主编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李亚舒等的《中国科学翻译史》、马祖毅的《中国翻译史》(上卷)、郭著章等编的《翻译名家研究》、孙致礼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穆雷的《中国翻译教学研究》等。在文学研究方面虞建华主编了《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一辑)。据我所知即将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学术专著有罗选民的《英汉话语分析比较研究》、马秉义等的《英汉语篇修辞对比研究》、文旭等的《英汉比较语用学》、何善芬的《英汉对比语言学》和朱永生等的《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对比研究》(教育部社科资金项目)等。关于学术论文我阅读范围很有限,给我留有深刻印象的是刘重德、沈家煊、申丹、朱永生、吕俊、钱冠连、许余龙、潘文国、谭载喜、罗选民、刘英凯、王东风、杨晓荣、穆雷等各位教授的多篇论文。我这儿只想提及潘文国在今年第1期《语言研究》上发表的长达27页的论文《汉语研究 世纪之交的思考》。文章总结了20世纪汉语研究的成就,重点分析了汉语研究中的普世语法观失误、语法中心观失误、重语轻文与重音轻字情结和科学主义迷信四大失误,明确提出了建立汉语自己的本体语言学的奋斗目标。差不多同时 史有为在今年第1期《语言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迎接新世纪:语法的百年反思》。我希望外语界学人关注、最好参与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我今天不评论这两篇文章的水平,只提出希望大家找来看看,读后想想他们提出的问题,想想自己的研究(特别从理论与方法论方面),我想一定会受到些启发,或者会找到更值得研究的问题。

1999年还有一件值得记入中国译学发展史的大事,那就是加

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国际著名翻译理论研究法英双语季刊 *META* 1999 年第 1 期为中国翻译研究出版了专号。全刊 213 页 共收 15 篇论文 英语的 9 篇 法语的 6 篇。14 位作者中属于我们学会的有 8 位 他们是王克非、申丹、罗选民、王东风、陈宏薇、柯平、方梦之、穆雷。这是一件大事 是我国翻译界第一次用这种方式跟世界各国同行对话。希望我们的三个专业委员会都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把我们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外的同行 加强相互交流 促进平等对话。以上不是完全统计 也不是系统评述 只是走马观花 说说我个人的一些感想。

2. 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

我们确定这次大会以“回顾与展望”为主题是想利用世纪之交的时机，对三个学科的去、现在与未来都能提出一些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思考与讨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才能看到学科发展的方向。有人说，一个不善于适时反省的民族是一个落后的民族、没有希望的民族。同样，一个不会选择时机进行反思，总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学术团体，也是一个无所作为、没有希望的团体。能够选择恰当的时间进行回顾与展望，这是学人的学术自觉性，有了这种自觉性才能不断地提高，不断地进步。我还想强调一个问题：真正的科学研究不应该完全以实用为最高目的，而应该坚守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原则，即人类应会用理性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

在语言对比方面这次我们想重点讨论吕叔湘先生生前批评的外语界与汉语界不相往来的“两张皮”问题。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一是因为赵元任先生说：“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分析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可见不进行两种以上语言的比较研究难以在理论上作出大的贡献。当然，赵先生这里说的比较也包括一种语言内部的比较，比如方言与标准语的比较，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的比较等。二是“两

张皮'问题不解决不但影响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而且影响中国整个语言学的发展。吕先生之所以对'两张皮'现象深为忧虑,主要因为:(1)推动中国语言学发展是汉语界与外语界(当然也是少数民族语言学界和海外研究汉语的学人)的共同任务,可是外语界学人很少关注并参与汉语的研究,汉语界对外语的研究也了解不多。(2)学外语的目的,吕先生说:"学好英语应当有助于提高运用汉语的能力,而不是相反。"(1984)这是从语言应用的角度讲的。吕先生又说:"介绍的目的是借鉴,是促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1989)这是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讲的。现在看,这两方面我们做的都有偏差。(3)语言研究的队伍建设问题。吕先生早年就倡导并实践用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70年代末写了《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的专文,80年代亲自培养英汉比较语法专业的研究生,可见吕先生很重视在语言研究者个人身上解决'两张皮'的问题。(4)研究方法问题。推动语言学发展需要比较的方法,那么怎么实现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有效的研究?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研究者较好掌握了母语和一种外语(当然两种以上更好)能独立进行比较研究;二是两个研究者,一个母语好一个外语好,两人通力合作。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比较法的运用只能限于一种语言内部的研究,那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许国璋先生和王宗炎先生对'两张皮'问题也讲得很尖锐很深刻。王先生评价许先生说:"近十年来,许先生屡次表示,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要打通。中文系不要只讲训诂、音韵、汉语语法、汉语方言,外文系不要只介绍、解释外国语言学派的论点,把自己局限于小天地之内。"(1995)王先生讲到外语界学人时说:"搜集采购之功多,提炼转化之功少。比方有的搞理论的人只是读洋书,讲洋道理,没有回头看看本国情况,把从外国学来的那些东西加以试用、验证、修正、补充。讲语力学的只讲英语语力学,讲语用学的只讲英语语用学,仿佛把外国教授的讲座搬到了中国。我们应当承认,这样做有其好处,因为引进了一些新学问、新知识,可是中国学者

不研究中国问题、汉语问题，拿不出本土材料来，很难说完成了自己的任务。”(1996)由此可见 许、王两位先生的思想跟吕先生的思想一脉相承。可能有人要问：我学外语的专门研究外语不行吗？隔壁人家的事情不能作研究对象吗？当然可以，但要做得好，恐怕还是以母语为主较好。沈家煊说：“从我国近代语言学的发展来看 有成就的老一辈语言学家 如赵元任先生、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等无一不是自觉地借鉴和运用国外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来对自己的母语——汉语作踏踏实实的深入研究，从而也从汉语的角度对一般语言理论作出了贡献。国外有影响的语言理论也大多是在提出者研究自己有切身感受的母语的基础上形成的。”(1996)沈家煊把自己写的文章分两类，一类是介绍国外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成果的文章，一类是自己从事研究写的论文。他说：“把第一类文章当作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看待是不对的，因为都是介绍人家的观点，没有自己的观点。我是学外语出身，但至今还不敢对一种外语（比如英语）中的某个问题作深入的研究。”(1999)因为他感到对外语的语感达不到对汉语语感的水平，研究外语研究不过以外语为母语的人，他主要以汉语为研究对象，但经常跟外语作比较，颇获益处。他指出：“目前有些外语院校的研究生论文只能以外语为主不能以汉语为主，这是一种很失策的做法。”(1996)

解决了认识问题，就是实践问题了。恐怕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教育改革中把中、外文系打通，交叉培养研究生，从观念和方法上逐渐改变目前这种中文系外语好的少、外文系汉语好的少的局面。这是涉及从小学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二是语言研究人员要补课。中文系毕业外语不好的补外语，外语系毕业中文不好的补中文。这种补课要有成效也并非易事，非有目标有计划不可，而且要长期坚持不懈才行。

“两张皮”的现象恐怕各个国家都存在，因为它是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如何处理母语与外语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王宗炎先生说：“汉语界和外语界似乎是由合而分 又由分而

合。’在前辈语言学家那里 没有两张皮 只有一条龙。王先生除给我们提出了四条切实可行的措施之外 还指出：“我们应当注意 英汉对比研究 有人把它视为专业 有人只是捎带着搞一搞。在阅读时 我们眼界要宽一些 两种人的成果都得重视。我们当然不能忘记 对比需要汉语界和外语界通力合作。我们要的不是两张皮 而是一条龙—— 一条兴云作雨，灌溉整个学术王国的龙。”(2000)

在翻译研究方面，我们提出了四个问题：(1)中国传统译论的梳理与评估；(2)国外译论的综合研究；(3)中外译论的比较研究；(4)译论多元探讨及其他问题。这四个问题都是翻译学科建设的基础研究。在这四个方面我们已做了许多工作，而且有了可喜的进展 不足之处是系统研究不够 中外结合不够。我们的翻译学科建设经过 90 年代的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理论上应该一抓系统研究，二抓中外结合。系统研究应突出三个重点：(1)翻译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所具有的个性与共性；(2)我国传统译论中的精华是什么；(3)外国译论中的先进成分有哪些。中外结合问题很难 吕叔湘先生说过：“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 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 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 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1986) 吕先生讲的是语言研究，也适用于翻译研究。我想结合不是两种东西相加 也不能是中医开西药、西医开中药式的两种东西相互套用或借用，而应该是杂交式的基本观念与基本范畴的改造与再生。可否首先将“翻译”、“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翻译科学”、“翻译的目的”、“价值”、“性质”、“方法”等八个基本范畴作为第三者，看中外译论中这些范畴的内容有何异同 有何优缺点 认真将两者加以比较 然后在中国译论母体中，将中外译论的精华结合起来 创造出新的范畴 而后再构建出新的二级、三级、四级……范畴 从而形成范畴体系。应该说这就是不同于前两者的新的理论形态。我想只有将系统研究和中外结合两项工作做好 理论研究的多元化才可能更有根基 更有生命力。还

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实用性翻译人才的需求量会空前增加，因此应用译学的研究应该放在一个突出的地位，这项工作我们一定不能视而不见。以上的说法，不知对不对，请大家讨论。

文化对比研究方面提出的问题涉及语用的差异、语言教学中文化习得、翻译中的文化传递、语篇模式与文化以及跨文化交际的模式。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属于语言内或跟语言学习与运用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的比较研究，这是我们文化比较研究专业委员会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普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随着文化交流的发展，我们应适应社会的需求而逐步开展专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比如中英哲学、伦理学、法学、史学、教育学、文艺学等学科的对比研究。我国的文化建设急需外语水平高的这类学科的专家，外语基础好的年轻同志可以去读这些学科的硕士或博士，逐步走到用中外两种语言研究专业文化的道路上来。我们学会应该倡导这类对比研究，欢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参加我们的学会或研讨会，以推动此项研究的发展。

3. 关于创新问题

我们的学会从井冈山比译学会第一次会议算起，今年正好 10 周年。从正式成立也已近 6 年了。我们学会在刘重德先生领导下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赢得了学风好、会风好的声誉。我们应该再接再厉，继续前进。最重要的是下大力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因为学会存在的价值在于它不断提高学术水平，促进学科的发展。刘先生在南昌会议上高瞻远瞩地对学会的发展提出了 5 项任务，而第一项任务就是大力增强创新意识。刘先生说：“学术研究的灵魂是创新，学科发展的标志是创新，学者的成就也在于创新。世界各国历来都把创新程度的高低作为衡量科研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准。”

那么学术研究怎么样创新？这是我们学会要研究的永恒的主

题。我想提出几点供大家思考。

(1) 创新能力需要丰富的知识，这些知识要结构合理而成系统 杂乱无章不行。其结构应该像个宝塔 先是自然、社会、思维三个领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然后是一、二、三级学科的两个基本，再就是三级学科的若干相关学科的两个基本。这三个部分的建设与优化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要洞察所研究学科的发展动态，始终站在学科发展前沿。这是创新能力的基础。

(2) 创新能力需要创新思维。我们知道创新思维的特点是：
A、思维方向上的求异性 也就是向成规和权威 包括理论、观念、方法等 挑战 勇于在陈规面前标新立异；
B、思维结构的灵活性，实际就是发散思维、集中思维、联想思维、直觉思维、类比思维等多种思维的综合运作，也就是广开思路，寻求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案；
C、思维进程的飞跃性 就是要善于运用非逻辑思维（主要是直觉和灵感思维）善于抓住由于多种因素碰撞而激发出来的新思想的一闪念；
D 思维效果的整体性，就是要把思维的成果放在整体系统中去思考 善于从全局把握思维成果的价值 处理好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E、思维表达的新颖性 这是表达方式的创新 也就是要创造新的概念、新的符号、新的图式、新的表述方式。这是创新思维的个性表现。

(3) 创新能力需要科学的方法。方法论在智能网络结构中属于软智能结构 它既可以使知识系统化 又可以把知识与能力巧妙地结合起来产生更高水平的能力。在研究过程中方法会帮助你打开新的思路 找到新的途径 采取新的方式 安排新的程序。

用上述创新能力需要的三个必备条件来看我们的教育，应该说这些方面都有明显的缺点。由于文理分家 中外文分家 语言文学分家，造成受教育者在知识结构上都有严重缺陷。王力先生说 他一生吃亏在于没学好数理化。形式语言学、数理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等学科在我国发展较慢 恐怕一个重

要原因是我们研究语言的人中懂数学、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的人太少。胡明扬先生说，我们的语言学研究已拖了计算机专家的后腿。由于轻视理论与方法论教育，形成了教育与做事都只看重结果而不重视过程的模式，在学术研究上注重考证、注释、评点，习惯于就事论事，不习惯于系统研究。不强调理论思维的重要和幸福，而用强调实用价值的种种说法来贬低理论研究的意义。我们的传统思维模式至今依然困扰着我们，“如观念上的唯上为是、唯书为是的权威意识；学术上的权威论证和习惯于考据；民族心理上的拒变、怕变的情性，教育上的背诵式、灌输式等，都是明证。”（高晨阳，1994：235）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4. 关于学风与会风问题

从学会创建以来刘重德先生讲得最多的就是学风与会风问题，大会讲小会讲，自己不顾年迈，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大家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这次他又执意遵守大会不带家属的规定，一人赴会。面对 86 岁高龄的刘老，我一是感动不已，二是于心不忍。同志们，如果我们把学术讨论会开成带着老婆孩子旅游的会议，那只能是我们的耻辱，也是给学会带来的耻辱，那是情理难容的。刘先生精心培育的优良学风与会风今天我想加以总结与重申。

（1）首先要有一个既有奉献精神又能任劳任怨、同心同德、团结合作的领导班子。常务理事要常理学会之事，无私奉献宝贵的精力与时间，思考学会的工作问题，克服遇到的各种困难。学术上要以身作则，孜孜不倦地研究，创造新成绩，对学科发展作出新贡献，并与理事和会员携手前进。

（2）要端正办会的指导思想，也就是一切为了提高学会的学术水平，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为落实学术为重的指导思想，第一实行信息公开。除大会期间发布学会的信息外，还在学会简报与有关学术期刊上公布会议信息与征文议题，也欢迎并特约会外专家学者撰文、与会。第二实行学术民主。审稿

和选稿的唯一标准是论文水平，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大会和分组发言都要合理安排，人人都有表达自己学术观点的机会。大会和分组发言都有评议和讨论，平等对话。

(3) 要有一个潜心学术研究并热爱学会的会员群体，不断为学会的建设出谋划策，帮助学会成长壮大。每次大会要提交高质量论文 履行会员义务 按时交纳会费。

(4) 学风要端正，治学要严谨，维护科学的尊严，反对弄虚作假 反对沽名钓誉。勤奋好学 谦虚谨慎。

(5) 开好会出好论文集。发布征文通知，定时审稿，优选大会发言人，筛掉不合格论文。无论文不能与会，与会者不带家属。会后修改论文，经三审优中选优编辑出版论文集。

同志们，我们要牢牢记住刘先生的教诲：“学风端正与否是学会成败的关键。我们反对一切不务正业而沽名钓誉、招摇撞骗的伪学者。我们呼吁学会全体成员共同努力维护科学的尊严，净化学术环境，认真把学会的学风与会风建设得更好，无愧于学人的清白与光荣。”

最后祝大会圆满成功！

[附记]

王士元先生已应邀准备赴厦门大会讲学，会前因急事赴美未能到会。王宾教授因病未能赴会，但送来了 *An Explanation of the Key Words Project* 的英文书面发言稿和关于书面发言的 5 条说明。王宗炎先生为大会写的专文《语言对比小议》，大会委托中山大学张美芳博士在大会上代王先生全文宣读。

参考书目：

高晨阳，1994，《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吕叔湘，1984年 11月 24 日为山西师范大学《英语辅导》(小报 题词。

吕叔湘，1986 序 见龚千炎著《中国语法学史》，1—2页 北京 语文出版社。

吕叔湘，1989 序 见陈平《现代语言学研究》，1—2 页 重庆 重庆出版社。

沈家煊,1996 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1 期,1—4 页。

沈家煊,1999 做研究和写文章 见张后尘主编《外语名家论要》,24—26 页,
北京 外研社。

王宗炎,1995,《汉英语文研究纵横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宗炎,2000 语言对比小议 见本论文集。

许嘉璐等,1996,《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北京 外研社。

(杨自俭 青岛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266071,zigian@sina.com)

语言对比小议

王宗炎

1. 一封语重心长的信

杨自俭先生从青岛来了一封信 其中语重心长 发人深省。

杨先生关心我国学术界的风气。他觉得，在外语界和汉语界，有些人很少往来。他说 这个现象先前吕叔湘先生叫做两张皮 许国璋先生也曾多次提及。

杨先生对汉英语言对比有兴趣。他希望两张皮问题能够解决 因为这样一来语言对比就会大有进展。

我感到，杨先生抓住了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他的启发，我回顾了历史，也展望了未来。我考虑到汉英对比能对外语学习有什么帮助，对语言理论研究有什么贡献。现在就把个人的一些意见摆出来 请大家思考和指教。

2. 历史的走向

任何事物发展的道路 从来是曲折的。就语言研究说 汉语界和外语界似乎是由合而分 又由分而合。

前辈语言学家如赵元任、罗常培、陈望道、林语堂、王力、吕叔湘 他们是中外兼通的。他们本来精通国学 又把外语研究和汉语研究结合起来。在他们那里 没有两张皮 只有一条龙。

现在的情况如何，我说不清，不过感到似乎有两种相反的倾向。

一种倾向是不好的——汉语界和外语界彼此疏远。这有种种原因。主观原因是眼界太窄，兴趣不广；客观原因是各人工作忙，收入少，抽不出工夫去研究与谋生无直接关系的问题。

另一种倾向是好的——汉语界与外语界逐渐靠拢。有一位外语界同事为了研究语用问题把过去出版的《中国语文》全部找出来，从头到尾地细读一遍。功夫这样到家，令人点头赞叹。

为什么外语界和汉语界一步步靠拢呢？这有许多因素。

首先，教外语，离不开翻译。对初学，不能不用汉语讲解外语；对水平较高的学生，有时也得借助翻译。

其次，我们的外语院系都有外籍教师。中国学生一碰到老外，自然会把他们的语言习惯和教学方式跟中国教师的互相比较，中国教师往往也对学生说明双方有哪些不同之处。

第三，对外汉语教学如今已成为日见其重要的学科，开设这门功课的学校已越来越多。教外国人学汉语的老师，自然不能不钻研外语，吕必松先生就是个榜样。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我们跟外国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无论在外交、商贸、科技、旅游哪个方面，都要汉语、外语并用。这里双方不能彼此隔绝，必须比翼齐飞。

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乐观。两张皮的现象虽则会逐渐减少，目前仍然存在。如何设法让情况更快地好转，这是我们大家的任务，尤其是外语界的任务。

3. 语言对比与语言技能

如果问，语言对比对提高外语技能有什么好处，任何有经验的教师都能不假思索就举出好些实例。下面这几个是信手拈来的。

(1) 学外语，必须了解其词义，可是有些词语的意思非对比搞

不清。例如：

汉语的“中学毕业生”，英语得怎么说呢？美国人说 a high school graduate，这跟汉语差不多。可是英国人的名称是 a school leaver，这在字面上就跟汉语相去很远。School leaver 的意义是什么呢？*Longman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简称 *Longman D.* 说是 a student who has just left or is about to leave school after completing a course of study 这个定义有多少中国学生能熟悉呢？再说，这只是英国人的说法。要是对美国人说 Jack is a school leaver 他便认为是个 dropout 即辍学生。

我们有宣传部，“宣传”在汉语指说明讲解 这有积极意义。不过不要以为“宣传”与 propaganda 相当。美国人认为，propaganda 这个词“often used disparagingly to connote deception or distortion”（见 *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 简称 *WNWCD*），英国人也说这个词“usu. derog. information that is spread in a planned or official way esp. by a government in order to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Longman D.*）。

(2) 学外语 必得学语法 可是汉英语法格式有不少分歧 这也非对比不明。例如，汉语代词和英语代词并不总是两两相当的。一般说来，“我”等于“*I*”；“我行我素”相当于 *I'll stick to my old practice* 但“我”有时又相当于“*we*”，“我校”可译为 *my school*，也可译为 *our school*，“我军”只能译为 *our army* 不能译为 *my army*。“敌、我、友”的“我”常常指的是 *we* 不是 *I*。

(3) 一个人怎么看自己和对方，汉语和英语各有不同的表现法。中国学生称同校的学生为“同学”中国教师也称学生为“同学”可是按英语习惯 前者对 后者不对。汉语“同事”常指同在一起工作的人 等于 *associate* 英语 *colleague* 则范围较宽 可指 a fellow worker in the same profession (*WNWCD*)。武汉大学的教师不会称北京大学的教师为“同事”只会说他们是“同行”。

“同仁”。另一方面，一个英国教师来到中国，他可能称中国教师为 **my colleague(s)**。

(4) 我们的话语结构的标志，跟英语也有出入。有个外国留学生说：“跟中国人打电话，我常常不知道他把话说完了没有，因为听不到 **good-bye** 或 **bye-bye**。”他不知道，中国人说“就这样”就等于美国人说 **so long**，再也没有下文了。

上头这些例子说明，为了掌握运用英语的技能，我们得随时进行语言对比，尤其是语境对比。

4. 语言对比与理论研究

从事语言教学或翻译工作的人，对各种语言往往作出某种估计或评价。下文根据所得的资料，谈谈英语与汉语分歧和类似之处，并提出对语言评价问题的一些看法。

A. 两种语言的分歧

(1) 同是一样东西，中国人和英国人的着眼点不同，因此给以不同的名称。一般说 **black** 相当于“黑”，**red** 相当于“红”。可是英语的 **black tea** 就是汉语的“红茶”，为什么呢？因为英国人注意的是茶叶本身的颜色，我们注意的却是茶汤的颜色。

(2) 同是一种颜色，汉语和英语可能加以不同的描绘。一般说来，**blue** 相当于“青”或“蓝”，**white** 相当于“白”。然而我们说，“这人气得脸色铁青”，英语却说，**His face was white with anger.** (*Longman D.*) 或者 **white with rage** (*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3) 一种颜色象征什么，汉语和英语可能相去很远。汉语“青眼”、“青睐”表示喜爱或重视，英语 **green-eyed** 却表示妒忌。汉语“眼红”表示妒忌，英语 **red-eye** 却表示失眠，如 **red-eye flight** 指路程很远，睡不好觉的飞行，见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4) 有的东西，汉语和英语的分类法不同。“柑、橘、橙”在我

们看来分明是三类，英语却统称之为 *orange* 见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 *armchair* 是一个人坐的，*sofa* 是两至三个人坐的，英美人认为截然有别 我们却笼统统统地都叫做“沙发”。

B. 两种语言的类似

在某些地方，英语和汉语有类似之处，而且类似得出奇。

(1) 两个相反的词可能表示相同的意义。这个现象两种语言都有。英语 *before* 与 *back* 是相反的，可是 *I told her that I had met John ten years before* 与 *I told her that I had met John ten years back* 意思并无不同。“老”是年纪大，“小”是年纪小，彼此相反。可是“老儿子、老姑娘、老妹子”并不表示排行在前，却表示排行在末了（见《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

(2) 汉语有些话不易找到确切的解释：“龙马精神”是什么精神，说不清；“气壮山河”是什么样子，难以想象。我们说“久有凌云志”并非想上天。英语有的话也很难下定义，为什么 *horse sense* 的意思是 *common sense*？为什么说 *He is as drunk as a skunk*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3) 我们有些民间流行的话，是先民曾相信占星术的证据，如：“寿星”、“灾星”、“福星高照”、“别在太岁头上动土”。无独有偶，英语也说：

(a) *He was born under an unlucky star.*

(b) *There was a bad railway accident that night — you can thank your lucky stars that you didn't travel by train. (Longman Dictionary of English Idioms)*

(4) 汉语有谦称和敬称，英语也有，不过方式不同。汉语的“贵姓”、“宝号”、“大作”、“拙见”完全是套语，英语写信给素不相识的人也说 *Dear sir* 或 *Dear madam*，这也完全是套语。

看了上头这些例子，你说在汉英两种语言中，哪一种是更明晰，更合理，更有科学性和逻辑性的呢？

搞语言对比，非但提高了我们的语言能力，还提高了我们的理